

走·近·大·家



一个真实的知识分子

水底的火焰

知识分子萧乾
1949—1999

◎丁亚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水底的火焰

知识分子萧乾

1949—1999

丁亚平/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底的火焰：知识分子萧乾：1949—1999/丁亚平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300-11783-6

I. ①水…

II. ①丁…

III. ①萧乾 (1910--1999)~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931 号

水底的火焰

知识分子萧乾：1949—1999

丁亚平 著

Shuidi de Huoy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6.75 插页 9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4 00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萧乾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京派作家，也是名记者，做过很多年的报刊编辑。这给他留下几个性格和教养上的特点。一个是意义非凡的文化教养和境界，他以境界行走天下，一生的短足和远行，一辈子的著作、行为和经验的分享，与此有关。另外一个充满人生的智慧，努力做真实的自己。巴金说，要说真话，他在肯定他的这位老友的观点的同时，说自己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记得季羨林先生也说：“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意思与他说的，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生体味。

我结识萧乾，是在1985年。那时，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里读研究生。为研究有关课题，经导师介绍，我去拜访萧乾先生。萧乾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待他人的充满热情和真诚的态度。这让人产生温暖如春的感觉。他深深影响了我，他对我的鼓励，让我永远心存感激。多年以后，萧乾先生在文章中称我是他的年轻好友，后来我的妻子商容也因为我的缘故，成了萧老的朋友——她为他编过集子，等到我们俩的孩子出生后，萧乾给我的信中，就由祝我们“双好”变成祝“三好”了。

他似乎希望也能和孩子变成朋友。仿佛真的就有缘。我那孩子，名字叫幼晗。一次萧乾赠书给我们，也加上了她。在写这个他称之为“小友”的名字时，忽然说，这个名字像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的名字，有特色。她在萧老住北京医院的最后日子里，随我们去看他一次。萧老去世之后，几次在电视里见到萧老的画面，就指着说“是萧老”。她当时才3岁多，就记住萧老了。

水底的
火焰
知识分子萧乾
1949—1999

最近，翻看文老师送给我的几个不同版本的《尤利西斯》，读到萧乾当年为译本写的长篇序言。其中，这样谈到翻译这部“天书”的过程：“1922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1994年中国才出个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1954年5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的高峰。”这个叙述，充满了浓郁的感情。整整四个年头，萧乾和文洁若每天清晨5点起床工作，一天下来，文老师初译一页原文，萧老校改十页译稿。每天在灯下聚精会神、不停地忙碌着。其中的艰难辛苦难以尽述。他们静静地靠着一种力量，完成着一个最为感人的传奇。

大约在1993年12月，忽然接连收到萧乾给我的两封信。信的意思为《尤利西斯》译事进入后期，正在大忙中，能否请我和通晓英文的商容，替他们将中文译稿给通读一下，不知我们腾得出手来否。他说，他不愿意看到洁若老师为此累死，“让别人看笑话”。接信后，我赶到他们家，接了一大摞的稿子，就回来了。在我们当时非常小而简陋的家，我们在又当餐桌又当茶几的玻璃台面桌上，把那个十六开的稿纸摊开，一个人念着稿子，一个人紧盯着可能的错漏，一边厢还核对着另一份交给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稿本，一干就干到了深夜。我们就这样每天“通读”，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到“天书”《尤里西斯》出版时，萧老在他写的译者序里，曾特别提到这个事情。

萧乾对翻译评价并不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洁若老师

到东京访学。萧乾给她写了不少信。其中的一封，谈到创作和翻译的比较。他说：“我绝不认为翻译低于创作，或对社会的贡献少于创作。孟十还、黎烈文、傅雷、高植、汝龙，都几乎只搞翻译。他们的贡献绝不亚于创作。正相反，我认为搞翻译付出的劳动要远远大于创作。倘若把社科和科技翻译也算上去，则翻译对国家的贡献更是远远大于创作。但是社会上给予他们的承认（精神上）及报酬（物质上）往往少于创作。这不公平。”^① 萧乾认为翻译是他们、尤其是文老师的中心事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萧老请我们帮忙，是不仅担心文洁若老师，还担心他自己。他八十多了，为译此著和文老师开起“夫妻店”来，本是文老师力主的。他们这次是拼了老命，但他也不想自己和文老师都累垮下来，那让别人会怎么说。萧乾年龄大了，很自然地，会特别关心他身前身后事。他有着别人会对他如何评价、如何进行历史定位的强烈期待与异乎寻常的关心。这和一些现代作家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他们的评价低不低，和巴金“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的一件事：读者、后代“将怎样论断我呢”，是一样的。

1957年5月20日，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中，萧乾这样写：“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制’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这话背后包含着他自己过去所受西方思想和英美知识

^① 文洁若编：《萧乾家书》，第272～27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分子的浸染影响，在温暖的日子里，被凝结和“潜伏”的类如这样的观点思想，就露头了。但是，他以为是值得作一番认真的探索的东西，很快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一周之后，《人民日报》上便发表了标志“转向”的《这是为什么？》一文。萧乾因此被划右派，受到大小批判会的无情批判。当时批判会上一些批判他的话，到晚年，萧乾似乎还不能释然。说他是“洋奴”、“泥鳅”，“脚踏两条船”云云，他不能接受。他和他的恩师沈从文的往事，以及其中的恩怨是非的原委，他也会说得格外详细。

记得在1994年年底，我几次去看他，都看到他把手边一本《文艺争鸣》杂志放在手边。这个杂志上面刊有某君责难他为什么不当张志新式的人物去为胡风为吕荧鸣冤的文章，称他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①。他为此难受，并且非常在意。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作《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②，做了反驳。他有自我期待，但也有一种要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多年前，他说起什么什么文章，会说自己读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太松散，有些地方太啰唆，有些地方太空，有些地方又太实。他说，东西写完，务必多看几遍。写的时候是作者。拿出去之前，你得以读者的心情从读者的角度去看那成品。文章最怕使人读了撇嘴，或莫名其妙。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变革，代表年青的新生代以至新的社会关系，不停地变动，永远不安定。这就是萧乾10年前去世，倒在新世纪的门槛，让我尤感伤恻的地方。萧乾说他喜欢和年轻人交往，是因为能不断地从年轻人那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减慢自己老化的过程。但事实上，在他那里，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我们从这位长者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思维活跃，但又时时用冷静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的深刻动荡与周围一切的动态的特质。他勤于思

①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载《文艺争鸣》，1994（6）。

② 萧乾：《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载《文艺争鸣》，1995（1）。

考、喜欢动笔，手边总放着一个一头用绳子系着笔的小本本，到80岁上，还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对抗平庸、庸俗，对抗固定和日益简单化的趋向。我想，人虽然会慢慢变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萧老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但是，像萧老这样的人，存留启蒙的概念和坚持，充满洞悉人生的智慧，尽显生命的奇迹，他的精神永在，他的作品常伴我们，他为他自己领取了进入历史、进入人们心中的通行证。我会把他的点点滴滴放在自己的心里。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的，相信历史也会。

本书全部图片的使用，都得到文洁若老师的授权和同意，特向文洁若老师致谢。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很难一一寻找照片、画作原作者，请有关作者与出版社联系，以便及时支付稿酬。

目 录

前言 // i

第一章 回来啦 // 001

第二章 晕眩的阳光 // 025

第三章 梦里梦外 // 049

第四章 风雨飘忽 // 063

第五章 旋转 // 085

第六章 雪打雾迷的日子 // 109

第七章 泥泞的世界 // 129

第八章 秋之赋 // 165

第九章 天书 // 187

第十章 素描 // 205

附录一 萧乾给作者的信(辑选) // 229

附录二 萧乾的著述 // 241

附录三 萧乾(1910—1999)的活动年表 // 247

水底的
火焰
1949—1999
知识分子萧乾



第一章 **1**
CHAPTER ONE
回来啦

水底的
火焰
知识分子萧乾
1949—1999

好像是游子有了“家”，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香港—烟台—北平，一路顺利。从在烟台上岸那天起，萧乾就怀着一种激动、好奇，和一丝不安。

仿佛是意识到他这归国抉择的艰难和今后道路依然并不平坦，对苦难总是了然于心的萧乾，在回到解放后的北平后，长叹了一口气：回来啦，可回来啦！

战后时期的战争、动乱和内伤状态，人民的痛苦、失望，即将彻底地告别；千百万人倾家荡产、流离颠沛、死于非命，终于要结束了。

萧乾期望什么？此前，他未在镰刀斧头旗帜下生活过。当他从香港动身赴北平时，发函给所有的朋友，嘱咐别再跟他通信，包括贺年片也别寄。在红色政权下将如何服从政治、怎样生活，他心里七上八下，并没底。但他有期望，他不时地用现实和他心目中所想、所愿，比较着。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①

^① 转见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17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① 萧乾向往的，并不是标揭太高的理想。

1949年1月2日，《大公报》刊出社评《新年的新希望》。其中，表达了知识分子“最低度的期望”：“要中国繁荣强盛，必须人民积极而主动，要排除本身疾苦，尤须人民积极而主动。‘民主’为今日主宰国族命运的人们所倡言，而中国人民对于国事应取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则是天经地义。”萧乾想的，和这一致。他作出他一生最关键的决定，胸脯挺了起来，勇敢地加入了。

他和家人，以及几个一道从香港来的地下党辗转赶往北平。过济南时，省委还设宴招待。后来他才知道，席间坐在主人位置的，是康生。

由山东坐火车北归时，途中可以见到不少战后的断壁残垣。“车过丰台站，转眼就望到东便门的角楼了。”萧乾的心激动得嘭嘭地跳了起来。到北平前门的东车站，来接他们的人紧握着萧乾的手道：“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下了火车后就住进了前门外西河沿亚洲饭店。这是萧乾重返古城后的落脚点。多年后，萧乾回忆说，亚洲饭店不大，可也得开两种灶。这是他面对的一个全新的问题。他多么想和一道从香港来的年轻党员同桌而食啊。可是不成。他们安排萧乾一家坐到小灶席上，自己却到大灶上去啃窝头。这件事使萧乾心里老大不安，同时，又从这个差别中觉出一种精神：共产党人到底不同。“他们先人后己，礼贤下士，使我感到自己在受到重视。而且他们口口声声称我作‘同志’，一点也不见外。”^②

① 出自《大学》。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② 引自萧乾：《生活回忆录》，见《萧乾全集》，第5卷，第22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萧乾将一切当作一种真实来接受。他逐步消解了自己的疑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什么都不让自己置身事外。

《中国文摘》（英文版）继续在香港出着，编辑人员却已到了北平。新的日子开始了。他们刚一卸下行李，就挽起袖子干了起来。“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洽。非党的常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党和非党人士的界限并没有被划得那么泾渭分明。萧乾说，他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一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不吃力了。”^① 开国后，几乎全新的群体和机构逐渐正规化。12月，萧乾等人在北京用电报遥编的《中国文摘》由香港迁到北京，并入新创办的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隶属于新闻总署下面的国际新闻局。该局局长由乔冠华兼任（他同时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和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副局长为刘尊祺，秘书长为冯亦代，徐迟等人也在此工作。萧乾在港期间参加《中国文摘》的改稿工作，并与乔冠华夫妇相熟。到北平了，深感工作愉快。杂志社员宿舍这时已搬到石驸马大街的一个三进深的住宅了。萧乾一家被安排住在尽后边一个小院里。

这时的萧乾，被任命为这份英文刊物的副总编辑，分工负责社会组，工作上颇顺手。他接受任务指派与分配，自己相应的行为也都成为恢复其自我感觉的一种前提和途径。

^① 《萧乾全集》，第5卷，第221页。

采访妓女改造，他写了特写《她们重见天日》。

他还以《人民中国》记者的身份，在北京郊区参加过不少次声势浩大的斗争会。

他回忆，会场一端照例是一座席棚，台上方桌旁，坐着大会的主持人。斗争对象猫腰站在台正中，两边是手持红缨枪的民兵。斗争会开始后，受害者一个个气冲冲地走到台口，指着斗争对象声泪俱下地控诉。有时气急了也上手打。这时，事先打过招呼的民兵还上前阻拦。斗争会进行时，下面照例有人带头呼口号。“与‘文革’期间的斗争会没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时还没发明出喷气式，一般也不挂牌子。”萧乾在忆述时，联想到了他在“文革”中看到的种种，和他自己惨痛的经历。破碎的图像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链条。作家叶兆言在《记忆中的“文革”开始》中，也道：“‘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①

由快转的速度呈现历史，是意味的！

1950年冬，萧乾到湖南去参加土改，遍访山乡村寨。这虽然是带着任务去做的，但对萧乾而言，是一次难忘的启迪。解放区的天确实是明朗的天。解放，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话题。

那真是他心情特别愉快，又特别活跃的日子。赴岳阳县篾口乡参加试点土改期间，萧乾拍摄了多幅照片。其中焚烧地契的那一幅，参加过第一、二届全国摄影展，而且，国外报刊也

^① 叶兆言：《记忆中的“文革”开始》，见《亲历历史》，第4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争相采用，甚至上了当年的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1993年7月，中央文史研究馆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世纪》创刊了。萧乾任《世纪》编委会主任。创刊号上，刊载了他拍摄的五幅反映他称之为“不流血的土改运动”的照片，并特别注出：^①

当然，这绝不是由于摄影的技术。那天拍时太阳已西落，而我的匣子里就只剩那么一张底片了。这幅照片之所以被人们看中，主要是由于画面上所表现出的农民们在烧地契时手舞足蹈的由衷喜悦。

岳阳县箕口乡的土改于1月下旬进入扫尾阶段。

萧乾临走时，农民们老老少少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坚持把他送了20里！

隆重欢送他的场景，让他难忘。他没有觉得它是传达出一种幻觉，相反，感到参加过这样打扫垃圾、除旧布新的壮举，自己内部在起着变化。他对革命的向心力愈益增加。他对人说过，苏联的二十大也罢，匈牙利事件也罢，并没动摇他这个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尽管，将世界包裹在一组照片或“连环图画”式的文字之中，未必就能让时间凝固，但为了清除这古老中国身上的脓疮，使她茁壮成长，当时的萧乾，确实是衷心拥护、热情投入的。

这时，国际新闻局已经改为外文出版社，人员也从几十增加到上百。语种多了，可英语仍是最忙的，因为除了本职工

^① 萧乾：《回眸不流血的土改运动》，载《世纪》，1993（1）。

作，还得不断接受突击任务：替外交部翻译去联合国的讲稿，到中南海为亚澳职工大会搞同声翻译，经常得坐在打字机前，吧嗒吧嗒到午夜。

1950年伍修权和乔冠华去联合国那次演讲，也是我们赶译成英文的……

那四五年，我安不安心？这不能用一句话回答。自己会点外文，能派上用场，并且受到重视，心里总是惬意的。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少数来自老区，多数是同我一样的“洋包子”，分别只在于他毕业于东吴或岭南，我的母校是清华或燕京；要不就是他留学法或德，我去的是英或美。^①

但是，那时萧乾的心里，不是没有阴影。1950年冬天，乔冠华要他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他的参访资格。他已能感觉出来，他的知识分子背景，那种“洋包子”精英，或精英主义，未必是那么合乎时宜。他努力使自己摆脱这一现状。

1950年5月出版的《人民中国》（第1卷第9期），发表了萧乾撰写的《五四运动》（The May Fourth Movement）。文章写道，五四运动使中国的进步力量获得新生，“五四”这一天，标志着封建主义和“反动派”的灭亡，是新旧民主的分水岭，是“革命的新青年与反动政体的第一次大碰撞”^②。文中，还批了被“美帝国主义”所恭称为“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胡适。

他清楚，其实自己就和胡适一样，是喝洋墨水过来的知识分子。求学英伦时，他还和胡适通过信。这当然是时代特定的

^①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179页。

^② 采用傅光明译文，见其所著《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第322页，台北，智燕出版社，1990。

语境，推动他进行这样的撇清式的批判。这里，颠覆了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新社会之中，普遍主义已被一种现实主义所取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观、生活态度、心理状态与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对其所作的要求，难免会有相当的距离。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强调团结、教育、改造。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批判《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梁漱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其发生的历史逻辑。学者陈晋说，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建立的时候，过去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然难以满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

例如，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光辉灿烂，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艺术标准是最高的。苏联的情况已摆在人们的眼前，以前对苏联的种种误解和歪曲，已经在几年来的战争和世界政治的发展中被事实所揭破了。苏联作品被视为先进的，苏联的生活与文艺以及电影等，所代表的是新的艺术、新的政治信仰、新的历史时代。而美国的电影，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反动的、落后的，是输出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手段，需要坚决抵制。这是当年萧乾的观点。

《两种制度、两种电影、两种英雄》^①，是萧乾 1953 年参加全国第一届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后写的，其观点颇有代表性。

从 1945 年 8 月至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上海进口美国影片达千部以上。而作为鲜明对照，在此后的 27 年间（1950—1977），中国仅仅公开上映过一部从第三国进口的美国影片《社会中坚》（1959 年摄）。该片由美国独立制片公司、采矿冶

^① 发表于《文艺报》1953 年 4 月 15 日第 7 期。